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理论及其理论体系

田雪原

【提要】 可持续发展有无理论支撑?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中,抽象出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以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发展需要为宗旨;以人力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为主要手段,逐步实现由物化资本为主向人力资本为主的转移;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基本模式,相应的理论体系为全方位适度人口论、资源稀缺论、生态系统论、总体经济效益论、社会协调发展论。

【作者】 田雪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迄今为止,一般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或国际间的行动纲领提出和阐发。那么这一发展战略或行动纲领有无理论依据,如有支撑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又是什么,对此近二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不少学者曾经作出一定探讨,提出诸如环境决定论、人口中心论、增长方式转变核心论等不同观点。不过,一是这种理论探讨为数不够多,二是探讨的深度有限,大多作为实证研究的一种铺垫。因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研究理论落后于实际现状,迫切需要深化研究。

结合可持续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抽象,笔者以为,以人为本发展观及其理论更具有本质特征,可构成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它的基本点是:发展的宗旨为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的途径为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尤为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逐步过渡到以人力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为主要手段的发展;发展的基本模式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相互促进和协调的发展,由此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基本框架为全方位的适度人口论、资源稀缺论、生态系统论、总体经济效益论、社会协调发展论。

1. 以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为宗旨

发展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本属天经地义,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竞争的日趋激烈,空前积聚起来的资本强烈地表现出自我增殖的本性,片面追求增殖速度和积聚规模,以最大限度的自我增殖为己任,使其脱离满足人的需要,走上为发展而发展道路。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前苏联为样板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理论上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为目的,实践上却走到短缺经济死胡同,背离了满足人的需要宗旨。这两种殊途同归的发展,遵循的基本轨迹是经济增长=发展。这样的发展即使可以满足人的某些方面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甚至以牺牲其他方面的需要为

代价换取发展。如毁林开荒、变牧为农和加快农药、化肥生产的发展,一时间满足了人口增长对粮食和其他食物的需要,但却以水土流失、气候变得干燥恶劣和水、土污染为代价,最终损害到人的身心健康发展。1998年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特大洪水,就是一例。据载,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由22%减少到10%,水土流失面积由占流域总面积的20.2%上升到占41%,致使广大地区天上降水携泥沙直奔长江,使河床、湖底越淤越高。同时在“变湖泊为粮仓”口号下加速围湖造田,湖水面积减少45%以上,八百里洞庭基本失去“吞长江”功能,其余湖泊作为“天然蓄水池”调节长江的能力也大大下降,使长江变得酷似历史上为害最甚的第二条黄河^①。40多年砍伐围垦带来的收益远远抵不过一场洪水造成的损失,而当年却是何等豪迈地赞赏过“向大自然进军”的“发展”!痛定思痛,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摒弃有利于一个方面而损害其他方面的发展。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通观《纲领》基本精神,这里的“人”指的即是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发展。

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发展的需要,按层次划分可分成生存、享乐、发展三种需要。最基本的是生存需要,它是任何社会人口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条件,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若不能满足总体人口对生活资料的需要,就难免“饥寒起盗心”,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若不能满足生产年龄人口对生产资料、产业结构的需要,存在大量“无事生非”失业人口,社会也难以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不过生存需要有个限度,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这种需要相对容易满足;而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享乐需要无限,但由于这样的享乐需要同样为发展提供需求动力,因而也是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之一。只是正常的享乐需要应限定在有益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有利于社会进步范围内。致于发展需要特别是提高人口科学、技术、文化素质方面的发展需要,不仅为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所必需,而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本文后面对此专有论述。

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中的“人”,既包括现实的当代人,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要求摆正和处理好在代际之间的发展需要的关系。传统发展观谈到满足人的发展需要时,不言而喻一般指当代人的需要,忽视了为满足当代人需要会给后代人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近来有的研究又出现一种偏向,在对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作出诠释时,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解释成主要是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将当代人放到次要或无足轻重的地位,造成理论上的错位或本末倒置。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是满足当代人全面发展需要的发展,忽视满足当代人全面发展需要的发展是不能有效推进的。只是这种满足当代人全面发展需要的发展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能建立在危及后代人需求能力基础上。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是典型的功利向当代人倾斜的发展;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意在改变这种倾斜,强调发展的代际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强调既利在当代又荫及子孙,有益于代际延续的发展。

2. 以人力资本为主要驱动力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什么是发展?就词语解释,发展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如从资源角度观察,则一切发展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发展

^① 夏斐:《如何根治长江水患》,《光明日报》,1998年8月28日;金辉文:《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文摘报》,1998年8月27日。

表现为资源进行物质变换过程。一般情况下,经济的发展表现为直接的物质变换,社会的发展有的表现为资源的直接物质变换,如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教育劳动生产率不变情况下,主要依靠教育投资的增长,教师和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设备增加的物质变换;有的表现为非直接的物质变换,但要以一定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如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常常借助于抽象力,不过这种抽象力离不开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即是资源物质变换的运动形态。这里,资源的物质变换既包括土地、森林、草地、河湖、空气、金属和非金属矿藏等自然资源的物质变换,也包括人力、知识、信息、技术、管理等社会资源的物质变换,主要的则是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相结合的物质变换。有“两种资源”和“两种资源结合”存在,就存在主从、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亦即发展以哪一种资源的物质变换为主导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表现出原则的不同。经济增长=发展的传统发展观,着力于自然资源的物质变换,追求自然资源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结果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质量下降,走上不可持续发展道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旧没有摆脱这种资源型的经济发展,重自然资源,轻社会资源,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基本处在传统工业化阶段,表现出很大的不可持续性。某些发达国家则相反,它们依靠本国人力资本、技术资本雄厚等的比较优势,将本国和进口来的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大大提高其附加值后,再行销售和出口而获取更多利润和自然资源,并伴之以某些传统产业向国外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科学技术的生产和传播即知识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将社会资源的物质变换提到主导地位,由此达到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在重视自然资源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资源,实现物质变换由以自然资源为主导向以社会资源为主的转变。

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使科技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由中期的3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70%~80%,一些高新技术部门甚至达到100%。当前这一新技术革命推进到以生命科学为带头学科的更高阶段,即由以往人的体能的外在化、物质化进到人的智能外在化、物质化阶段。生物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克隆”技术的某些新的突破,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被提高到决定未来经济发展命运的高度,预示着人类社会向智力工具过渡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人类已经历过的手工工具和正在经历的机器工具时代说来,智力工具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它将人的智力开发放在首位,人口智力投资的增长,人力资本的积聚正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有的国家、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在以自然资源物质变换基础之上,经过一个时期比较迅速的发展以后,陷入技术落后,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之中,表现出发展的难以持续性;有的国家、地区重视社会资源在物质变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人力以及信息、技术、资本等的积聚和增长,在当前经济不景气大环境中获得较快发展,表现出很强的发展后劲儿,创造出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正反两种发展实践表明,社会资源的开发利用,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资本的积聚和增长,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在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推动力在人力资本。

3. 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系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不仅体现在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路径上,而且贯穿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形成不同方面的交叉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是这诸多交叉发展的协调性和连续性,而这一点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做到。即建立涉及发展主要方面和交叉发展的以人为本或曰人本理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不过这里的

人本理论和哲学上的人本主义还不尽相同。按照罗森塔尔、尤金编著的哲学词典解释,人本主义是一种“离开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而把人主要看作生物学上的生物的哲学原则”;我们讲的人本理论的人是处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即将来临,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人,具体时代人的抽象,而不是脱离社会发展的纯生物人的抽象。至于人本主义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则是合理和有益的。如此确立在人本理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可由下述五个方面支撑的理论组成:

其一,全方位适度人口论。适度人口论产生于本世纪初,在对人口规模与资源之间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两个概念。当人口规模处于再增加或减少均不能带来好处时,便称这一人口为适度人口。如以 O 表示适度人口, A 表示实际人口, M 表示人口数量失调程度,则:

$$M = \frac{A - O}{O}$$

若 M 为正值,说明人口过剩; M 为负值,则人口不足; $M=0$ 为适度人口。其后适度人口研究提出和论证了带来最大经济福利效益的经济适度人口,带来国家实力最大化的实力适度人口或社会适度人口等,取得不少进展。不过至今适度人口研究还主要限于人口数量上的考察,很少涉及其他方面;而随着 21 世纪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世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过渡到零增长,人口质量、分布和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将突出出来。适应这种新的发展,适度人口概念需要更新,从仅仅是人口数量上的探讨,进到包括人口质量、结构等方面的全方位的“适度”。就世界人口总体和中国 21 世纪人口变动走势而论,实现适度人口需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注意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和城乡、地区分布的调节,实行控制、提高、调节相结合并以控制为重点的方针。从动态上制定一项集控制、提高、调节于一体的适度人口目标难度很大,但是结合具体发展进程,一定时期适度人口目标的制定是可能的。按照这一赋予新涵义的适度人口理论,实现人口自身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交叉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现实可行性的。

其二,稀缺资源论。既然发展是资源的物质变换,当然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总体资源状况怎样,就成为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笔者以为,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如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一样,既是绝对的、无限的,又是相对的、有限的。总体上是稀缺的,是绝对的和无限的,指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认识、开发和利用资源能力提高无限,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原本未列入资源范畴的成为新的资源,甚至是价值更高的资源。是相对的和有限的,指在一定经济技术水平条件下,人类认识、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受到限制,任何资源都有一定限度,并非永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在总体上资源是短缺的:非再生资源消耗后不可复得,绝对数量在减少;可再生资源若再生的速度赶不上人口、经济等的增长,稀缺的程度也会加深。由于人们普遍追求高生活质量,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不断上升,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表现出很强的“加权效应”,人均资源消耗增长速度急剧加快。面对 21 世纪中国加速走向现代化和上半叶人口增加 3 亿左右方可实现零增长,可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树立资源稀缺意识,以稀缺资源论作指导。

其三,生态系统论。建立在时空的分离性和认识来源的物理经验性基础上的近代科学,发展沿着“分解”、“还原”的路径延伸,导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分割,自然界中有机界与无机界分割的认识论和实践,使人类越来越生活在间接的人造环境之中,而很少过问这种间接的人造环境是否符合客观世界运动规律,是否具有科学的连续性。新兴的现代科学一反这种“分解”、“还原”的思维定式,发展具有交叉、边缘、融合的特点,给建立在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基础上的

生态系统科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生态系统科学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机物与无机物的统一,强调生命是包括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在内的地球系统的中心,从生态学角度解释地球的存在、演进和发展。由于自然界自身反馈机制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无生命物质之间进行着连续不断的能量转换和物质变换,维持着一定的生态平衡,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一旦来自外界的干扰超过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解能力,平衡就要被打破,能量物质交换遭到破坏,使生物与环境之间失去平衡,发展变得不可持续。当今最主要的“外界干扰”来自人类社会。传统的发展已使大量物种灭绝并制造出一批“人工物种”,震撼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要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自觉而又积极地归入生态系统。

其四,总体经济效益论。自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J. M. Keynes)主义盛行把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以来,工业化规模经济膨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它所带来的效益。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无视这种传统经济发展产生的负效益,必须在注重企业个体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总体经济效益;顾及近期经济效益的同时顾及长期经济效益,树立新的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发展观。

一是质量效益发展观。传统的经济发展片面追求产量、产值和利润,主要通过生产规模数量上的扩大,即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实现,造成资源利用率不高、污染严重等“工业病”。可持续发展立足于社会总体经济效益最大化,要尽可能地减少资源的浪费和治理污染的费用,就不能一味地走外延式扩大再生产道路,转向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在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问题上更强调质量,以质量求发展,靠质量实现总体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是广义空间效益发展观。有两种不同的投入产出:狭义的投入产出为生产经营产出与投入成本之比,广义为全社会产出与投入成本之比。传统经济发展只注重前一种,可持续发展更注重后一种投入产出。在发展指标设定上,可持续发展也要跳出单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束缚,选择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健康、生活质量等在内的更能反映广义空间效益的指标。采用这类综合指标不仅有利于比较科学地评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达到的水平,而且可以清除国际间外汇比价不尽合理等因素影响。广义空间效益发展观要打破仅就本企业、本地区看待经济效益的狭隘观念,把包括资源、环境、社会发展在内的外部效应收入评价视野,从经济增长和发展造成的内部结合上看待效益,对待发展。

三是长远时间效益发展观。经济发展当前的效益自不待言,可持续发展总体经济效益发展观,要求在重视近期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长远时间效益,不能以牺牲长期效益为代价换取近期效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的“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既有人口生产的代际问题,又有近期和长期时间效益的关系问题,可持续发展更注重长远时间效益是区别于传统发展的一个标志。由于更注重长远时间效益,发展不仅需要经济成果的积累,还需要看这种发展对自身能力的影响,有利于还是削弱自身发展的势力,削弱自身能力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长远时间效益发展观应将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上,保证新的发展潜力的不断涌现。

其五,社会协调发展论。社会表现为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环境生产、精神产品生产交叉生产过程中,交叉组合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总和。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协调发展观,就是要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发展相应的社会事业,建立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要随着改变,进步的意识形态以及先进的政治的、

法律的等政府组织、管理应运而生。可见,社会的协调发展带有整合的性质,是多种生产能否有条不紊发展的整合器,应予充分重视。结合可持续发展实践,以下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更应引起关注:

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先发展经济,待到经济发展后再来解决人口、失业、污染、贫困等社会问题的路子是不可取的。这不仅增加了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同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宗旨背道而驰;而且社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妨碍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及时公平地解决社会问题,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同步发展。

二是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三次产业结构怎样,既表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也说明社会进步的程度,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环保、商饮、服务等第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协调状况。从理论上说,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第三次产业应占到适当的比例,过高可能陷入福利国家的泥潭而妨碍发展,过低则可能阻碍技术进步和改革,同样有碍于发展。

三是内部与外部的协调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国家、地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联系和相互影响空前加强起来。当前,在可持续发展深入人心和一系列国际公约公布于众情况下,不仅一个国家的经济、人口、环境发展受到周边以及更多国家关注,而且政治、文化、法律等社会状况怎样同样受到关注。可持续发展推进到今天,各国都在塑造自己的形象,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于一体,求得发展互动平衡的总体形象。协调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忠实履行国际承诺,不仅有助于这一良好形象的塑造,而且为切实推进本国乃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所必需。

参 考 文 献

- 1.《21世纪议程》,联合国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国家环境保护局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
- 2.《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
- 3.陈耀邦主编:《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
- 4.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海洋出版社,1994年。
- 5.张维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7年第1期。
- 6.田雪原:《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
- 7.《田雪原文集》(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 8.周丽苹:《四种生产论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5期。
- 9.赵善伦:《生态系统学说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科学》,1996年第6期。
- 10.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f Action adop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airo 5-13 September 1994.《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Volumel,1995.
12.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94.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